

#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迷信救灾

张堂会

**【摘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现代文学真实地展现了自然灾害下迷信之风盛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迷信救灾现象,反映在水、旱、雹、蝗、疫等各种灾情之中。

**【关键词】**现代文学 自然灾害 迷信救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5-0104-05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12年~1948年的37年期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次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在灾害频发的年份,全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如1928年有1029个县次受灾,1929年有1051个县次受灾。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等各种气象灾害,还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既有蝗灾、螟害、鼠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也有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等灾害,并且这些灾害大多并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常常是祸不单行、连续不断或交相发生。在所有的灾害中,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在37年期间全国共有7408个县次受灾,年均200个县次;其次是旱灾,共有595个县次受灾,年均161个县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灾,共有1719个县次受灾。<sup>①</sup>

自然灾害发生后,许多人的信仰发生偏移,想在频仍的灾害中寻求帮助和精神的慰藉,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迷信巫术之风盛行,胡适对此现象有过感叹,“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sup>②</sup>他的话道出了大多数灾民的心态,即在灾害发生

后意志消沉、情绪低落,不是积极地去救灾,而是困守“听天由命”的迷信处境。

## 一、水旱灾害中的祈雨与求晴

由于最常见的是水旱灾害,抬龙王祈雨与求晴是最为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民国历史上这类荒诞不经的事情屡屡发生,尤为令人可笑的是政府官员往往也热衷于参与其中,甚至是“率先垂范”。1926年春夏之交,闽北、闽西十余县山洪为灾,入夏之后又三月不雨,四十多个县田亩干焦,防疫流行,米价腾飞,素以产米著称的富庶之地反而要向海外采购。在此情况下,“官民上下除从事祷神念经外,别无良策,每日钟鼓震天,锦旗载道,界大小神像满街奔走。”全城几无没有一处不在举行祈雨运动,制造了种种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但没有求来雨,反而求来了蝗虫,“适西北两乡近有蝗虫发现,千万成群,漫空蔽日,扫食禾稻,顷刻一空”。<sup>③</sup>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这时就有人出来说此次水灾是龙王爷显灵,原因是汉口人把龙王庙毁掉了,

①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37页。

②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8页。

③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56页。

所以龙王要降大水来淹没汉口以示惩罚。当地的老百姓便在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组织下，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旧址上摆设香案敬奉香火，对着江心三跪九叩，祈求龙王爷饶恕并保佑他们。

蒋牧良的小说《旱》详细地描绘了迎龙王祈雨的场面和过程。由于久旱不雨，禾苗枯焦，金阿哥作为“纠首”带领村民在炎热的太阳底下祈雨。小说总共十一章，竟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写迎龙王祈雨的仪式，充分地展示了这种“求雨”的风俗文化。求雨时必须穿得整整齐齐，不能擦汗，如果违背了规矩龙王爷就会生气。他们抬着龙王爷的轿子，鸣锣放铙，一路焚香，浩浩荡荡地从庙里把龙王爷接回村庄，全陇上男女老少都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等龙王爷。村人公请谢六秀才来主祭，他跪在香案前带领大伙跪拜行礼，并提起全副精神念求雨疏，气氛肃穆庄严。村民也在人堆里喊着：“龙王爷爷大显威灵！龙王爷爷救救我们！”举行求雨仪式后，他们顺着原路再把龙王爷送回龙王殿。由于天气炎热，好多人的衣服都沾在皮肤上。谌太爷没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伸手想去揩揩脸上的汗，一想起求雨立刻又把手放下来。金阿哥抱怨“花户不齐心，玷秽了龙王爷爷”，才导致龙王爷不显灵；谌太爷则大骂老太婆祥训嫂，说她把当老鸨的女儿接回村，弄脏了村子才致使龙王爷不下雨。明天再求不来雨，他就要去找祥训嫂拼命。下午四点多钟，大伙把龙王爷送到了龙王殿，等待道士的占卦。道士闭上眼睛，把两个手板塞在大袖子里，嘴里念着诀，然后把竹菟丢到地上，“又是三个阳卦”，道士告诉大家，“菩萨说的一四七有雨下。”求雨的人没人再问，都苦笑着溜出了庙门。小说对农民祈雨的风俗作了详尽的描绘，写出了农民久旱之下求雨的虔诚畏怯的心理，展示了一群老中国儿女在天灾面前顺天从命的可悲画面。

石灵的小说《捕蝗者》详细地描写了农民久旱之下举行“抬龙王”、“刨旱魃”祈雨的迷信活动。从端午节到六月十几，一个多月没有落过一滴雨。村上一些爱热闹的青年在老年人的怂恿下，挖了黄泥塑了一条泥龙，放在一条又宽又长的木板上，由十来个壮汉抬着。前面由一队头戴柳条帽的儿童开道，从东庄到西庄挨门逐户地讨钱和粮食去买香烛，“供奉着这个泥塑的然而被认为主宰着农民的命运的怪物”。吝啬节俭的农民对此也格外慷慨，乐于赞助，很是热闹了几天。可香烧了不少，雨还是一滴没下，人们的热情就渐渐地冷淡了下来。年逾六旬的李三老爹对此非常不满，认为他们只是当儿戏闹着玩，一点也没有虔诚之心。村里人无奈之下又想到了抬龙王，龙王爷是不能轻易抬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动它，因为它的脾气特别坏，惹恼了它，要么是给你干旱到底，要么是一连下个几十天。人们焚香叩

头，大清早把龙王爷从庙里抬出来放在桌上暴晒。李三老爹让人闪开，并叫娘们把孩子都带到一边，以免触了忌讳。龙王爷被抬到古庙前面的广场上，放在一根朱红的旗杆下，面朝南方，从日出到日落都可以晒得着。有人拿来一面杏黄旗，高高地扯在旗杆上随风抖动，并从庙里抬出一个笨重的大铁香炉放在龙王架前。一阵锣鼓响起，一些人成排地跪下去磕头；一些人抱着成捆的香纸投到大铁炉中，一时火焰冲天；还有一些人在广场上无目的地东奔西跑，场面热闹非凡。当太阳渐渐升高时，人们头上开始冒汗了，便纷纷回家。每天都有人去 看龙王有没有出汗，如果龙王被晒得出汗了就表明要下雨了。可每天都是失望的消息，愈是烧香，龙王爷的脸越干。有人气愤不过，夜里拿着草鞋偷偷地去搨龙王的嘴，第二天还能看到龙王脸上的泥底印子，可就是没有一点汗迹。终于有一天龙王发汗了，可是却空欢喜一场，晴朗的天空里连瓜子大的云彩都没有，太阳照样放着刺目的光芒。有人哀叹道：“唉！遭劫了，天意要灭这方人。”于是，他们又想出一种祈雨的方式，决定去刨旱魃。旱魃是传说中一种能引起旱灾的怪物，是人死后一百天内所变。变为旱魃的死尸不会腐烂，坟头渗水，坟上不长野草，旱魃夜间还会往自己家里挑水和粮食等东西。只有把旱魃刨掉烧了，天才会降雨。他们扛着铁锹、铁镢等农具在龙王庙前汇合，准备去刨张四财主的坟。因为有人发现只有张四财主的坟头是潮的，肯定是旱魃无疑；有人则说天变阴的时候，看见其坟头上站着一个人拿起黑扫帚和黑畚箕对着云彩扫，几下子就把云彩给扫散了；还有人说看见张家大门口的路上洒了一路的粮食，是旱魃把别处的粮食挑回家时漏下来的。于是，刨坟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原野上，嘈杂的喧嚣声洋溢了四野。“走到那个黄土堆近边的时候，像预备歼灭巨敌似的，猛然地发了一声喊，包围了上去。践着那久干的新土，泥面直向半空中喷。”有人上去一锹就把坟顶铲开了，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把各自的农具伸了下去。由于坟的面积不大，好些人在后面叫喊着让自己也刨几锹。黄土堆不一会就被铲平了，露出了生着绿苔已经有些腐烂的棺木。有人就惊叹说长起绿毛了，如果再过几天不刨就要出来吃人了。有人就在棺材头狠狠地劈了一下，棺盖上立刻裂开了一条缝。有人又来了两锹，说要打得他万年不翻身。人群骂够了看厌了之后，就带着各自的农具四散回家了。而过了不久，在刨开的暴露的棺材旁，张家在哀哀地哭着，筹划着改葬的事情。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详尽地叙述了祈雨中各种迷信活动，描画了一幅旱灾下骚动纷乱、灰暗麻木的民俗图，让人对灾荒下民众的愚昧偏执痛心不已。

## 二、视蝗虫为神虫而顶礼膜拜

民国时期蝗灾仅次于水旱灾害，在各类自然灾害中居第三位。据吴福祜《中国的飞蝗》一书统计，以1920年、1927年、1929年、1933年~1936年、1942年~1947年、1949年这14个年头计算，全国共有1269个县遭受蝗灾，年均受灾达91县次。<sup>①</sup>由于蝗虫习性奇特，平时不见影迹，一旦发生，跳蝻往往片刻之间就积地没膝，而飞蝗则又遮天蔽日，造成极大的灾难和饥荒。由于民智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把蝗虫看作是神虫，认为蝗灾是上天谴罚，非人力所能避免，只有烧香求神保佑了。民间的蝗神信仰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全国各地到处都建有反映蝗神信仰的腊八庙、刘猛将军庙。一些人把蝗虫看成神虫而顶礼膜拜，举行各式各样的迷信活动来禳灾。1931年6月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记载江苏江北一带发生蝗灾，“各县愚农，迷信极深，当飞蝗飞落时，多焚香祝拜，冀其飞去。”1934年夏天，江苏因严重的干旱导致禾苗枯萎，河道干涸，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淮阴、阜宁、泗阳等20多个县到处都是飞蝗跳蝻，伤害禾苗。1934年8月19日《上海新闻报》记载：“江苏海州城北庄发现蝗蝻”，“现已吃尽秋禾，灾象甚重，乡民抬土神游行示威”，借此来消灾弭祸。

李季的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描写了发生蝗灾时，不去积极捕蝗，而是希望通过烧香求神来退蝗虫的可笑场面。由于天旱少雨，1946年7月陕北一个叫水漫凹的村庄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蝗灾。年轻人主张打蝗虫，而上了年纪的人却认为“那是神虫，越打越多哩；想要退蝗虫，还是要靠神仙才行。”于是，在老阴阳的带领下，许多老人来到了西山上，摆上供桌，上面放着一只活羊。老阴阳跪在虫郎爷的牌位前，其他人跟着跪在后面，点上香，把给虫郎爷上的表和祭文烧了，敲钟打鼓唱着表章：“愚民万死，得罪上天。天降蝗虫，民遭劫难。野草吃尽，禾苗将完。民为邦本，以食为天。五谷不收，民运难堪。祈神开恩，救苦救难！”由于延误了捕蝗的大好时机，老阴阳自己家西山上的那块庄稼也被蝗虫吃光了。

即使有科学的宣传与治蝗团体的提倡，治蝗有时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民国时期，村民对治蝗工作多有抵触情绪，担心治蝗会殃及自家田地，治蝗委员的工作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还经常受到农民的责骂，“好狠心的委员，左不划，右不划，单划到我的稻田里掘沟，我不是该死吗。哼！治什么蝗虫，不靠天收，看你治得了不！”<sup>②</sup>有时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许多地方的领导人都是热衷建醮的领头人，他们往往发动村民百般阻挠治蝗工作。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就遇到过这类事情，他

带人在江西湖口指导治蝗，曾经劝阻当地的联保主任停止建醮，几十个农民手持铁锹、锄头等农具闯入他的休息室，大骂他的治蝗方法是骗人的，没有什么效果，责问他为何阻止他们建醮。<sup>③</sup>灾民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求神禳灾上，往往会延误治蝗的大好时机。

## 三、疫情下的迷信疗法

疫灾也是民国时期经常发生的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一类自然灾害。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劣，加之医学技术水平不发达，政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又极为有限，人民的卫生意识十分淡薄，极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疫情。根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有关资料的统计，从1912年~1949年的38年期间，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巨大灾害就有75次，其中疫灾19次，占重大自然灾害的25%，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重大疫情发生。特别是1932年有一次以霍乱为主的全国性大疫灾死亡估计近40万~50万人，波及范围最广，死亡人数最多。<sup>④</sup>疫情发生后，国民政府抗灾救灾的能力也极为薄弱。1906年，中央才有卫生行政机构；到了1934年，全国共有医师7881人，药师380人；<sup>⑤</sup>1947年，全国也只有16所省级传染病院。<sup>⑥</sup>疫情发生后，民众多用驱疫避鬼的迷信方式来救灾。在1932年的大霍乱中，在天津地区，“一般无知愚民，遂竞相传说，一谓‘瘟疫下界’，再谓‘闹白莲教’，愚民之感觉恐慌者颇众。各地民众多悬挂旧历年所贴‘吊旗’，据云可以禳免杂灾，日前更有小报大登特登，谓‘白莲教将出世，凡某家门上抹有血迹者，数日内必致死亡净尽，其预防方法，为用红棉纸将灶口封闭，可以免灾。’”<sup>⑦</sup>在包头地区，“惟人们迷信颇深，认为疫疠之来，冥冥之中必有鬼神主持其间，故日来大打其所谓善会，邀集喇嘛僧道，聚而捧经，间杂以乐器，其热烈不下民六绥远省鼠疫最烈时之情况。”<sup>⑧</sup>现代文学对此没有漠然视之，对天花、疟疾、鼠疫等疫灾下的迷信疗法作了生动形象的反映。

吴组缃的小说《黄昏》描写了天花流行时招魂习

① 吴福祜：《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版，第2~6页。

② 小山：《治蝗琐记》，《江西农讯》1935年第12期。

③ 陈家祥、钟秀群：《湖口彭泽治蝗纪实》，《江西农讯》1935年第12期。

④ 余新忠、张笑川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280页。

⑤ 《申报年鉴》，上海申报年鉴社1936年版，第1296页。

⑥ 《中华年鉴》，中华年鉴社1948年版，第1851、1854页。

⑦ 《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⑧ 《大公报》1932年7月23日。

俗。一个老太太由于儿子、媳妇的自杀，毫无能力医治得了天花的小孙子福宝，只能跑到大街上用嘶哑的声音召唤被鬼带走的灵魂，“福宝子呀，你上学放学，大路小路上受了吓，跟奶奶回家呀！福宝子呀，你墩上水边，攀高下低，狗子猫儿，牛羊牲口，吃了吓，奶奶的万年火照你回家呀！福宝子呀，你明处暗处，受了惊吓，跟奶奶的万年火回家做太公呀！”这声音来回地喊着，到后来低哑得听不清字眼，只成了一片模糊凄切的哭喊声，散布到模糊的昏暗里。沈从文的中篇小说《泥涂》描写了长江中部一个大市镇的贫民窟里天花流行，造成了死者相藉的惨剧。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其病毒能对抗干燥和低温，主要通过飞沫吸入或直接接触而传染。接种天花疫苗是预防天花的最有效办法，对于天花患者要严格进行隔离，对病人的衣物用具等要彻底消毒。但对于小说中贫民窟中的穷人来说，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希冀能有一阵大风刮去散播天花的小鬼。“一切都只盼望刮风，因为按照一种无知的传说，这种从地狱带来的病，医药也只能救济那些不该死的人，但若刮了一阵风，那些散播天花小鬼，是可以为一阵大风而刮去，终于渐渐平复的。”可是这阵风却没有如期而至，“这收拾一切的风，应当在什么时候才来？上帝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地方既然为天所弃，风应当从哪儿吹来？自然的，大家都盼望着这奇怪的风，可是多数人在希望中就都先死去了。”

鲁彦的小说《岔路》中写袁家村和吴家村鼠疫蔓延，村民相信关帝爷能够驱散鼠疫，决定请出庙里的“关帝爷”神像出巡。于是两个村的村民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扎花，有的折纸箔，有的买香烛，有的办菜蔬。他们两村人清早三点就带上所需物品，络绎不绝地赶往关帝庙。在香气弥漫中，正总管严肃地站在神像面前虔诚地祈祷道：“求神救我们袁家村和吴家村！”副总管则带领所有的人跪倒在四周的台阶上。他们把神像连座椅一起扛出来，安放到神轿里。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回村里，他们一路呼号，炮声和鼓声震撼着两旁的树木。两村人在岔路口发生了争执，都想把神像先抬到自己的村庄供奉，结果大打出手，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械斗。两村的首领吴大毕和袁筱头也被疯狂的人群挤倒在地，他们颤动地呻吟着，“关帝爷救我们两村的人！”而此时，“关帝爷愤怒地在路旁蹲着，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受了石子的伤，他的一只手臂和两只腿子被木杠打脱了。他本威严地坐在神轿的椅子上，可是现在神轿和椅子全被拆得粉碎，变成了武器。强烈的太阳从上面洒到他的脸上，他的脸同火一样的红，愤怒地睁着左眼，流着发光的汗。”关帝爷不但没能阻止鼠疫的流行，村里人反而是加倍地死亡。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浙东农村祈神攘灾的风俗，在鼠疫的威

胁下人与自然、生存与死亡的矛盾，最终被宗族的权势和名誉的矛盾所代替，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让我们领略了旧中国农村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制度的严重危害。

方光焘的小说《疟疾》讲述了一个30来岁的农村妇女患了疟疾已经十几天了，可是她却不请医生来看病，在家里苦苦地挨着，一方面是不相信请医服药的科学治疗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多花钱。后来，她听信了吴妈的建议，忍痛离别自己的幼子，回娘家去“避避”，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病躲掉了。可是，等她到了娘家以后，她还是觉得渐渐怕冷起来，后来身上越来越感觉冷，身子渐渐的发抖起来，她才明白自己的病并没有被躲掉，疟疾还是照样发作了。

#### 四、自然灾害下迷信风行的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迷信之风盛行，出现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巫术救灾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灾害频发，国力不振，根本无力救灾。“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为，何必庸人自扰？”<sup>①</sup> 蒋梦麟的这段话道出了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心理。民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某种虚无缥缈的神秘力量上，祈求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就是强大的传统的因袭作用，由于教育不昌、民智低下，民众缺乏一种科学的观念，只能因袭继承传统的鬼神崇拜的信仰。那些庄严神圣的仪式和肃穆庄重的气氛，已经内化成一种精神符号渗透到民众灵魂的深处。好多民俗中都蕴含着灾民的敬天保命的思想。山东滕县由于雹灾频发而产生了一种祭雹的民俗，于每年四月初一举行祭祀雹神的仪式，并宣读祭文。其中有一条祭文如下：

今有XX村善士XXX统领合村民等，谨以香茶果供、金银宝马，敢昭告于沧浪之神（指雹神）台前，曰：盖闻民为国本，食为民天，芸芸众庶，温饱所愿。雹冰斯降，实生眼前，哀鸿遍野，妻离子散。伏乞尊神，幸加重怜，五风十雨，赐我丰年。我悲愚民，谨且蔬荐，神其有灵，享我蒸献。  
尚飨！<sup>②</sup>

<sup>①</sup>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sup>②</sup> 李桥：《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44页。

这则祭文典型地表达了灾民祈求风调雨顺以求温饱的心理，其背后反映了民间普遍的鬼神崇拜现象。赵文甫的诗歌《祭灶》描写了民间祭灶的习俗，灾民们在灾荒中只会虔诚地焚香叩头祈求，在这种习俗背后传达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麻木。

人们叫穷困揪着心头，  
脸上都烙满了憔悴和痛苦；  
但愿明年是一个大有年吧！  
谁敢不秉着一腔虔诚去叩头乞求？

一束束黄表化为白灰随风飘扬，  
一个个心愿也随灶王到了天上；  
最后再叩上个“千斤头”吧！  
那颤动的哀音仍然蠕动在咽喉。<sup>①</sup>

再一方面就是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尊严，大力宣扬天命论，将天灾下人民的苦难归因于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鬼怪，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来转移民众的愤懑情绪，让他们安于现状，以此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1924年夏，湘江流域发生水灾，省长赵恒惕率队亲自前往南岳祈福。长沙天晴水退之际，长沙知事曹献廷不但没有迅速组织救灾，反而不惜耗费人力财力，大张旗鼓地组织群众搞迷信活动，通讯《长沙水灾中之怪剧》就为我们描绘了这一荒诞的场景。7月14日，他在城内外组织了250多个团队，手持乐鼓仪仗，扮作鬼怪唱着小调，游神者达3万余人，总计耗费数万元。省署居然派出军警到场，以军乐队为前导。姓陶和姓李的两个真人各自乘坐八个人抬的绿呢轿子，每乘轿子都有数名武装军警护卫。<sup>②</sup>

秦似的杂文《祈雨和掘水》辛辣地讽刺了国民政府这种劳民伤财、愚弄民众的迷信之举。大旱之下，政府用飞机把能海法师接到重庆去祈雨讲经，在抗战经济紧张的困难情形下花去了二百多万元。结果还真的下了一点雨，能海被一些阔佬们捧上了天。另一个和尚巨赞法师却在西山受难，因为天旱山水枯竭，山顶上的小沙弥苦于要到山下很远的地方挑水，就把泉底掘深一点，结果水源反而不济，有民众就控告他毁损乳泉洞。通过对

比，作者形象地戳穿了求佛祈雨的骗人把戏，“不管你是肥头油脸地为地狱装潢，还是相信人间确有着实在的活路，总之，那件袈裟是大可以脱下来的了。”政府这种巫术救荒的欺骗性做法有时连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1933年黄河水灾时，孔祥榕担任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赈组组长。他毫无水利知识，平时迷信至极，每次主办堵口工程时，都大搞“扶乩”活动，在工地上设立临时的“大王庙”，把一些从水里爬出的蛇、蛤蟆、老鳖等东西当作“大王爷”、“将军”等来供奉，还为它们搭台演戏。<sup>③</sup>难怪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覃振不无愤怒地指出：“水患决非天灾，乃由于治水未努力”。<sup>④</sup>1934年，江苏久旱不雨，各界人士纷起而作求雨之举，“迎神赛会无虚日，迷信之风一时大盛，社会秩序为之骚然。”<sup>⑤</sup>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日记中感叹云：“连日盛暑，农田龟坼，殊伤农事，乃崇异端者，尤日以膜拜为事。国将亡，听于神，侗矣。”<sup>⑥</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W117)和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1009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毕业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① 周启祥：《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 ②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 ③ 钱钢、耿庆国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54页。
- ④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 ⑤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 ⑥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5页。

## A Review on Superstitious Relief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Modern Literature

Zhang Tanghui

**Abstract:** A lot of natural calamities brought great affliction to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uly exhibited the superstition which prevailed in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sulted in all sorts of superstitious relief reflected in the water, drought, hail, locusts, epidemics and other disasters.

**Key words:** modern literature; natural disasters; superstitious relief